

英帝国的“推力”与布尔人的“民族大迁徙”^{*}

孙红旗

内容提要 19世纪的布尔人“民族大迁徙”是研究南非历史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究其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英帝国的“推力”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成为开普殖民地的主人后，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殖民当局颁布了旨在促进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系列农地制度改革措施，以及给予科伊人和班图黑人某种平等地位、实行自由雇佣制的“第五十号法令”与“释奴法令”，最终迫使布尔人集体逃离开普殖民地，深入内陆建立起“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并在那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从而对南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英帝国 南非 布尔人 民族大迁徙 “第五十号法令” “释奴法令”

作者简介 孙红旗，历史学博士、徐州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教授（徐州221116）。

关于布尔人大迁徙的原因，每个研究南非历史的人都需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因为大迁徙是南非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事件，从非洲人的角度看，它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白人殖民者的占地远征；从布尔人的角度看，这是他们的“民族史诗”，部分西方史学家对布尔人大迁徙满怀同情，把它描述为一个独立的、新的民族力图摆脱英国人的专制统治、争取自由的壮举，是一次与白人民族斗争中悲壮的“伟大的民族自我退出”¹。至于大迁徙的原因，史学界众说纷纭，例如有的学者称大迁徙是由于布尔人“嗜好旅行和冒险”，“热爱荒漠中的自由”，害怕农场的扩展会受到限制^④，有的学者坚持认为，市场要求和商业扩展是大迁徙永远不变的经济动机^⑤；有的史学家则认为，布尔人大迁徙主要是政治原因，即他们对英国殖民当局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及各项行政措施表示不满，因而“大迁徙是一种政治抗议的形式”^Ⅲ，“是一次反对英国政府的叛乱”^Ⅱ。还有人认为，布尔人的举动是“为了保证布尔文明扩展到新地方，而不致被英国文明所融化”^Ⅳ。更有学者认为，每个参加大迁徙的布尔人家庭都各有不同的原因、动机和目的，例如著名史学家沃克尔（E. Walker）就持这样的观点。

^{*}本成果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07FSS001）资助。

¹ 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 on the South African Frontier 1652-1836*, California, 1957, p. 19.

^④ See *ibid.*, p. 3.

^⑤ 北京大学郑家馨和李安山二位教授也持此观点。参见郑家馨：《论南非布尔人大迁徙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5期，第221~234页；静水：《布尔人大迁徙的经济因素浅析》，载《西亚非洲》，1988年第1期，第62~66页。

^Ⅲ Flin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V, 1976 p. 367.

^Ⅱ L. Thompson and M. Wil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Vol 1, 1969 p. 406.

^Ⅳ [法国]路易·约斯著；史陵山译：《南非史》，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31页。

笔者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并不一定要对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进行定性,其主要任务就是要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1836年开始的布尔人大迁徙,是18世纪初以来布尔人殖民土地扩张的继续,但它与18世纪持续进行的布尔人迁徙运动又有明显区别,人们不能仅用19世纪以前特别是19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推动布尔人历次土地扩张浪潮的一般原因来解释,如布尔人粗放经营的经济结构、牲畜贸易的刺激、农场主对土地的贪求、劳动力短缺、干旱威胁、人口压力等,¹而必须重点考察英帝国因素的“推力”的巨大作用。因为自从英国人成为开普殖民地的主人后,无论人们强调布尔人大迁徙的哪一方面,都离不开英国人统治下殖民政策的变化和班图各民族对白人统治的能动性反应,如果说后者对布尔人的大迁徙是一种“阻力”的话,那么前者,即英帝国的“推力”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推力”迫使布尔人改变了迁徙(即土地扩张)的规模 and 方向,并给南非历史发展带来非同寻常的影响。

那么,英帝国的“推力”到底如何促使大约1.4万多名布尔人在1836~1848年陆续离开了开普殖民地,越过英国人设定的“东部边界”,经过千里跋涉,最终到达德兰士瓦高原和奥兰治河流域,建立起自己的“共和国”和“自由邦”?换言之,英国人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最终导致了布尔人大迁徙?

农地制度改革措施令布尔人“撤出”开普殖民地

英国人所以能构成对布尔人大迁徙的“推力”,并非如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布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纯粹是由于军事上的压倒优势。19世纪初,尽管英国人和布尔人一样都是南非的殖民者,但英国人的到来和布尔人有很大的区别。与布尔人相比,英国人经过了工业革命的洗礼,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代表,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化身。根据英国人的看法,每个人、包括布尔人,都须服从“文明化”进程,必须接受英国的宪政制度、语言和文化,因为他们的宪法、语言和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④事实上,是英国人创造了现代南非。布尔人将欧洲文明置于脑后,而英国人又把它带了回来。布尔人只是在空间上穿透了这个国家,而英国人则在经济上打开了这个国家,并给这块次大陆带来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就布尔人来说,作为南非大草原上的一个“白人部落”,他们已经错过18世纪,19世纪忽然急速来到了布尔人面前。布尔人过惯了几乎没有行政管理限制的自由日子,现在一个大帝国权力施加的法制和无处不在的秩序纠缠着他们。英国的侵入最初使布尔人厌烦,后来使他们愤怒,日积月累,世代相传的怨恨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把一个由无拘无束的个人组成的一盘散沙般的群体转变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单位,并以其顽固不化而令世人困惑不已。

事实上,所谓的“民族大迁徙”不是唯一、甚至不是那一时期最大规模的民众迁徙。确切地说,当1816年“斯拉格特斯内克”事件^⑤酿成之时,布尔人就开始迁徙了。殖民当局关闭“边疆”和币制变更^⑥也只是激起更多布尔人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布尔人再也无法适应英国人的一系列根本性和制度性的改革。有的学者强调说,18世纪以前移民运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的,但18世纪以后,任何经济方面的原因都必须置于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原因之下。其根本原因是1806~1836年间英

¹ See W. K. Hancock, “Trek”,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X, S. S., 1958. Quoted from D. Hobart Houghton and Jennifer Dagut, *Source Material on the South Africa Economy, 1860-197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9.

^④ See Bernard Makhosazwe Mago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e and Class in South Af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p. 33.

^⑤ 1816年,布尔人弗雷德里克·贝佐伊顿赫特因抗拒1名英国少尉和12名科伊桑人士兵的传讯,被当场击毙。弗雷德里克的兄弟扬发誓要报仇,策动边境农民谋反,事发后拒降被杀,同谋者中5人被判绞刑。

^⑥ 1825年大英帝国将本国货币引入所有殖民地,在南非取代了自英国人第二次接管开普以来就不断贬值的荷币(Rix dollar)。由于南非布尔人的抵制,直到1841年才完全排除荷币的法币地位。

国人对殖民地政府和社会实行了改造，施行法治，将官方权力延伸到布尔人生活中从未被触及的方面，并有可能使种族融合。¹ 1842年，彼得马里茨堡国民议会的一项备忘录说：“英国政府在殖民地不断宣传和实施的有关我们的法律，是我们离开这个国家的唯一原因。”^④ 从根本上说，正是英国人革命性的变革促成了布尔人大迁徙。

所以，导致布尔人大迁徙的第一个因素缘于法制方面。具体地说，英国人的地制改革和为实现劳动力自由雇佣而实行的法律平等措施令布尔人无法容忍。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一般都是首先始于农地改革，经历过圈地运动的英国人深知土地私有化对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性。1813年总督约翰·克拉多克（Sir John Kradock）认为，自1714年以来布尔人实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租地农场制度实际上已经失控，建议减少租借农场的规模，并让租地者交纳更多的税金，同时明确地权。上述改革由此逐步进行，但成效并不明显。归结起来，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1）取消租地农场制度，实行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和永久化。占有土地的规模和交纳的租金成正比。19世纪20年代英国移民就是按照此原则取得土地的，虽然在此过程中并未严格地照章办事。1832年，英国宣布此后不再随便分发“皇室土地”（即边界以内的土地），一概改为公开拍卖。（2）1824年规定以奥兰治河为开普殖民地的北界，禁止布尔人农场主随意越界占据新的土地。（3）在东部边疆地区有争议的凯河地带，只有英国人和为殖民地服兵役的科伊人才有权获得土地。1836年10月，开普当局一度下令所有白人殖民者必须从前一年用武力兼并的阿德累德省（凯河和凯斯卡马河之间）撤出，并颁布《好望角惩罚令》宣布开普殖民地法庭对南纬25度以南地区的所有英国臣民，当然也包括布尔人在内，负有全责。这几项法令遭到布尔人农场主的激烈反对。在布尔人看来，英国人颁布的土地政策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及其子孙后代获得土地的天赋权利”^④，并将使他们今后随意占领土地的行为受到严格限制。

新的土地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布尔人迁徙，本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英国人的政策使边界内不再有空地，而边界以外有大片肥沃土地“这个现象说明了全部迁徙史”^{1/4}。其实，不同阶层的布尔人农场主所受的影响各不相同。对于已拥有大片肥沃土地的布尔人农场主来说，新的土地政策并没有造成现实威胁，而对于缺乏“好地”或拥有较少土地的年轻而又贫穷的布尔人来说，这确实是促使他们进行迁徙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那些开疆拓土的急先锋来说，他们已经到达奥兰治河北岸的肥沃牧场，可以随意占据非洲人因“姆法肯战争”而放弃的大片土地。因而，对英国人新的土地政策作出“迁徙”反应的首先是他们。其后才是中等富裕的布尔农场主，他们中的许多人刚从开普西部地区迁到东部边区，他们起先还被允许在有争议的科萨人土地上建立农场，以为从此可以沿着印度洋海岸继续东进，但1836年英国人鉴于时机还不成熟，下令他们撤出，使这批布尔人不仅东扩的期望成为泡影，还蒙受了“莫大侮辱”。同时，受到已经移居奥兰治河畔布尔人的鼓舞，他们也开始做好北上寻求沃土的准备。是年冬天，大批农场主在雷提夫率领下渡过奥兰治河北迁。尽管不是最后、但是最难下定决心加入大迁徙队伍的是布尔人中的富裕农场主。不同于缺乏土地的贫穷阶层和东迁不久的中等阶层，他们大多已经定居边区多年，拥有良田万顷，身居地方显贵，“边界之外有大片空地”的诱惑尚不足以促使他们抛却经营多年的地产。除非经过权衡认为新的土地具有以下几个优厚条件才能让他们举家搬迁：第一，使他们的后代分家后可以不受限制地得到约36 496.35亩（6 000英亩）的土地，如同他们在原来的东部边疆一样；第二，可以重建商品经济，保持和外部市场的联系；第三，更重要的是，可以接近或拥有一个不受英国人控制或不依赖于他们的海港，以便同

¹ See D. Hobart Houghton and Jenifer Dagut op. cit., pp. 9-10.

^④ G. W. Eybers *Select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Illustrating South African History*, pp. 167-174. Quoted from D. Hobart Houghton and Jenifer Dagut op. cit., p. 10.

^④ E. A. Walker *A History of Southern Africa*, London, 1928, p. 180.

^{1/4} Neumark op. cit., p. 21.

欧洲商人直接进行交易。正是抱着这样的期望值，1834年富裕农场主里卡特率领部分布尔人离开大鱼河，千里迢迢向德拉果阿湾进发，直到在纳塔尔受阻为止。

“第五十号”法令和“释奴法令”迫使布尔人举家“逃离”

进一步真正触动所有布尔人民族（阶级）利益的是英国人颁布的“第五十号法令”和“释奴法令”，这是驱使他们极力摆脱英国人统治的关键所在。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布尔人的经济地位，更关系到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到19世纪30年代，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白人殖民地中，只有南非的布尔人中还没有分化出雇佣劳动者，南非的劳动力阶级几乎全部由非洲民族构成，白人移民经济若离开非洲人的劳动力就几乎无法维持其正常运转，白人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中若少了奴隶和仆役，白人就不再是“白人老爷”。正是由于英国人在一段时间内允许甚至纵容他们那种早已落后于时代的生产关系，极富反抗精神的布尔人才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身于英国人统治之下达半个世纪。也正是由于拥有大批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劳动力，布尔人才能凭借对“人的占有”与英国移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展开竞争，一度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挤出了农场主行列。尽管弃农经商的英国人把农畜产品的收购价格压得很低，布尔人农场主由于不必支付雇工的工资而把产品成本维持在最低水平上，任凭市场风暴的冲击而不致被压垮。殖民政府一旦废除这种带有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制度，那么，建立在这种制度基础上的布尔人的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可能随之坍塌。

那么，“第五十号法令”对布尔人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英国人直到19世纪才驻足开普，在1820年之前，英国移民的目的地一般是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1820年英国对南非进行“系统殖民”¹，5000名英国移民涌入南非东部边疆地区，在尝试定居农业失败后，有相当一部分人随着美利奴羊的引进而转入商业性牧业经营。这样，在当地本来就紧缺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中，又加入了直接为英国毛纺业服务的牧业资本家的竞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相对自由的雇佣劳动力的存在，而1809年英国人作茧自缚的“霍屯督法令”，以及在布尔人当中盛行的近乎垄断的奴隶制和人身依附制等于排除了英国农场主在劳动力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可能性。因此，英国人的当务之急是让擅长放牧的科伊人劳动力“自由化”。1828年，开普殖民政府终于颁布了“第五十号法令”，即《关于改善霍屯督人以及开普其他自由的有色人种处境的法令》，废除了对科伊人的一些种族歧视性限制，如取消了“通行证法”，允许科伊人自由“流浪”；改革“学徒制度”；规定科伊人有权占有土地，在法律面前有色人和白人有“平等的地位”。^④

“第五十号法令”一经公布，便遭到了布尔人各阶层一致反对。农场主们纷纷抱怨“由于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不服从主人和逃亡，移民们的困难越来越大”，他们极力阻挠和抗拒法令的实施。但英国殖民政府的铁石心肠和强有力的镇压措施令布尔人不再抱有幻想。他们看到唯一的希望就是带着科伊奴仆完全脱离开普殖民地，避开英国人的干预，在边界外的广大地区重新确立“主、仆之间的适当关系”^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在迁徙中带走了至少1.4万名科伊人和混血人仆役。

我们再来看看“释奴法令”对布尔人的影响。释放奴隶的法令对布尔人究竟有多大影响，学界也有多种不同看法。如传教士利文斯敦认为，大迁徙就是“由于荷兰殖民者反对释放奴隶引起的”^Ⅳ。

¹ “系统殖民”是由英国人威克菲尔德（Wakefield）提出的一套理论，其核心内容是通过移民在殖民地自然分化而产生自由雇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④ See D. Robinson and D. Smith ed., *Sources of the African Past* London, 1979, p. 31.

^④ Ibid.

^Ⅳ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London 1875, p. 29.

有的学者认为，布尔人农场主携带奴隶越出边界，实际上始于大迁徙。¹ 但大迁徙队伍中，98%的布尔人为东部和北部边区的殖民者，他们拥有的奴隶只占整个开普殖民地奴隶总数的16%，因而不能说“释奴法令”是他们大迁徙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奴隶在布尔人经济中的比重是依地区自然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例如东部边疆大鱼河流域是有名的牧区，布尔人农场主多以放牧牲畜为主，使用的劳动力也自然以熟悉放牧的科伊人为主；在水源和土壤肥力较好的谷地，布尔人农场主也种植一些经济作物，如小麦、烟草、葡萄等。一般来说，种植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要比纯粹的牧业大得多，而科伊人又不谙农耕，因此承担此类劳动的任务就落到了进口奴隶的身上。此外，正如新的土地法令对不同阶层的布尔人影响各异一样，“释奴法令”在这方面的影响差异更大。对于没有多少奴隶的中等农场主和还没有使用奴隶的贫穷农场主来说，直接影响很小。但对富裕农场主的影响就非同一般了。显而易见的损失是，按照“释奴法令”，殖民政府应该赔偿布尔人2 824 244英镑，而英国人只给付了1 247 401英镑。^④ 不过有的学者认为，这些财产损失并不足以让布尔人离别“故土”，因为奴隶不像科伊人那样没有市场，而是可以买卖的，东部边区许多布尔人农场主只是奴隶的租赁者和使用者，而不是所有者，因而他们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失，所以学者们应该把“释奴法令”对东部边区迁徙的布尔人的影响分成财产损失和劳动力损失两个方面来看。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这样一来，即便不拥有奴隶，没有劳动力或潜在的失去劳动力的可能性已经足以让边区所有布尔人都不寒而栗。当然，对那些富裕的农场主来说，他们在财产和劳动力两方面都蒙受了现实的损失，特别是劳动力方面的损失对促使他们参加并领导大迁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迁徙的主要首领之一比勒陀利乌斯承认：“迁徙的主要诱因，是对解放奴隶的不满。殖民地的农业和其他经营都是靠奴隶劳动力，给予他们的主人和所有者的补偿是远远不够的。”^④

失去劳动力是布尔人关注的核心问题，这并不是英国人给予他们足够的经济补偿就能令他们平心静气的。布尔人所要求的补偿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纯粹经济的要求，最为关键的内容隐藏在经济要求的背后。英国人在1833年宣布废除奴隶制度的同时，还规定被释放的奴隶应作为自由劳动力就雇于原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人只要投入一定的可变资本，仍可继续使用原来的劳动力。从经济角度考虑，他们也许不会吝啬到一毛不拔的地步。但问题是，奴隶制所反映的、或者说主仆关系所代表的，是一种绝对不平等的人际间的全面关系。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松动，必将动摇整个关系的基础，从而一发而不可收拾。而这正是自1652年布尔人登陆好望角以来一直实行的种族歧视措施的根本所在。大迁徙的著名领袖雷提夫的胞妹（一说为侄女）安娜·斯廷康布的话很有代表性。她说：我们反对的“与其说是给予奴隶自由，不如说是让奴隶同基督徒处于平等地位”^⅔。因此，正像许多史书提到的那样，不是解放奴隶本身而是“解放的方式”伤害了他们。^⅔ 在这里，奴隶的解放和科伊人的自由一样，不仅是对布尔人经济利益的冲击，而且是对布尔人整个社会秩序的冲击。尽管英国人颁布的第五十号法令中的“自由”、“平等”等概念只是点缀，正如后来的南非史所证明的那样，但这无论如何已经不能让布尔人容忍。布尔人一方面在《大迁徙声明》中假惺惺地宣称，“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决心坚持公正合理的自由原则……一定不使任何人沦为奴隶”^⅔，另一方面又表示绝对不能容忍被释放的奴隶享有与白人一样的平等地位，否则，“我们宁愿离开”^⑧。他们要奔向以下几种地方：“无论是英国传教士还是英国化的霍屯督人都不会使布尔人感到讨厌的地方；卡菲尔人对他们恭顺的地

¹ See Cole, *The Rise of South Africa*, Vol III, London 1926, p. 460. Quoted from Neumark, op. cit., p. 19.

④ Neumark, op. cit., p. 174.

④ Waker, op. cit., p. 199.

⅔ Ibid.

⅔ See Oliver and Atmore, *Africa since 1800*, Cambridge 1972, pp. 60–61.

⅔ D. Robinson and D. Smith, ed., op. cit.

⑧ Oliver and Atmore, op. cit. p. 61.

方；可以找到良好牧场并便于猎取大象、水牛、长颈鹿的地方；人们能够自由生活的地方”¹。

布尔人最终未能占领纳塔尔沿海地带和德拉果阿湾，而是进入了德兰士瓦高原和奥兰治河流域。不过这里基本上满足了布尔人对上述4个方面的要求。土地依然广阔而富饶，并且可以不受英国殖民政府限制地从非洲人那里抢夺。再也没有谁来妨碍他们的自由意愿，共和国的建立也随心所欲，直到各共和国之间发生严重的对立和冲突。最后，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共和国内，布尔人确立了纯粹白人的统治。1854年德兰士瓦宪法开宗明义地宣称：“无论在教会或在国家中，有色人种与白人之间绝对没有平等可言。”^④ 为了保障劳动力供应，布尔人废除了英国人颁布的“第五十号法令”，公然全面恢复了1809年的《霍屯督法》。非洲人不再具有奴隶身份，但布尔人用通行证制度等强制方式把两个共和国境内的非洲人“联合”到他们的父权制家庭中，每个布尔人家庭农场都是一个独立王国，统治多个非洲人家庭。为了让非洲人世世代代为布尔人提供无偿服务，布尔人实行以“学徒制”为掩饰的童奴制。共和国的法律明文规定，每个农场主可以收养3~4名“卡弗尔儿童”作“学徒”，直到男的年满25岁、女的年满20岁为止，在此期间，他们必须为主人无偿劳动。实际上，很少有布尔人家庭遵从名额和时间的限制。“学徒”们长大后，别无出路，只有继续在布尔人农场上做工，这时，他们的身份往往变成了“劳役制佃农”，即由农场主给他们一小块土地耕种或放牧，而他们每年必须为农场主无偿劳动90~180天，正如大部分黑人农奴或牧奴所做的那样。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和杂役名目的增多，劳动力往往不敷使用，布尔人为了存储后备劳动力，将被征服的人口较多的非洲人群体安置在农场附近的“特居地”中，每当需要时，便下令酋长进行征调，被征用的非洲劳动力自己负责食宿，其任务就是无偿地为布尔人提供运输、修路、军差等服务。布尔人的说法是：“允许他们呆在我们的国土上，这就是我们给他们的劳动报酬。”^④

就这样，布尔人用大迁徙方式逃离了英国人的控制，也逃离了19世纪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几乎退隐到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Ⅳ 直到19世纪的最后20年，他们才被矿业革命的引力拖出荒僻的高草原，进行反向的“又一次大迁徙”，从乡村走到都市。大迁徙的意义不仅在于布尔人占据了非洲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在于他们在德兰士瓦高原上孕育了新的剥削形式的胚胎——特居地和保留地，为实行严格意义上的“种族隔离”制度埋下了伏笔。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末，总地来看，英国人一直在驱赶着布尔人，但正像非洲大草原上的生物圈之间存在着食物链一样，南非的经济关系中也存在着链式效应：英帝国的“推力”如同狮子一般驱赶着布尔人逃往内陆，而同样食肉的布尔人如同狼群扑向“羚羊”一般的原居民，这就是南非次大陆上的“动物哲学”，这就是整个19世纪南非的全部政治经济史。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詹世明)

¹ 转引自[苏联]莫伊谢耶娃著；开封师范学院地理系译：《南非共和国经济地理概况》，河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页。

^④ Eric A. Walker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8 (South Africa, Rhodesia, and the High Commission Territor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397.

^④ Livingstone op. cit., p. 39.

^Ⅳ 布罗代尔指出：“根本不可以将封建社会看成是在自然经济范畴中的一个封闭的、完全自给自足的结构。实际上，在封建社会里到处都有市场。当然，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与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商品化尚未向全球方向推进。一般来说，市场或在当地，或在远处，很少形成‘区域性’的结构。”参见[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杨起译：《资本主义的动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3页。布尔人的两个共和国就处于这种封建社会状态，而不是完全与世隔绝。

Promotion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Mass Ethnic Migration of the Boers

Sun Hongqi

pp. 33– 38

The Mass ethnic migration of the Boers known as the Great Trek in 1880s is a topic that cannot be avoided in South African studie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essential reason is that the British Empire promoted the migration. After becoming the master of the Cape colony,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y which had experienc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romulgated a series of land reform measures so as to promote the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the colony and

laws such as giving the Khoe and Bantu equal status in society, implementing Act No. 50 of free employment and the laws of releasing slaves so that the Boers had to collectively escape the Cape colony and founded two republics of the Orange Free State and Transvaal. They hence established the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n interior and influenced South African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Philosophical Views of Ibn Rushd: A Master of the Arab Peripatetic Philosophy

Ding Shiren

pp. 44– 48

Along with rise of the Islam in Arab Peninsula, some fashion of seeking for knowledge and spirit of developing rationality beca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mong the Muslim who had accepted the Islam. The recovery of rationality and call for knowledge spent the Arab 200 years converting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achievements that the Greeks created in centuries into their own. In philosophy, an Arab Peripatetic school characteristic of the Greek culture came in the Muslim academic system. As a master

of the Arab Peripatetic Philosophy, Ibn Rushd made indelible contributions in maintaining rationality, spreading and succeeding the Greeks philosophy, which greatly accelerated coming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His philosophy represented the mainstream thought of the Arab philosophy in the medieval era, 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and also the efforts that the Arab philosophers made in reconciling such contradictions.

Decree Law No 3030 and the Reform of Istanbul Metropolitan Municipality

Che Xiaomei & Hou Zhijun

pp. 49– 54

Decree Law No 3030 issued in 1984 inaugurated new perspectives for Turkish municipal reforms. Decree Law No 3030 coming into force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urkish municip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However, shortcomings of the decree, concerning especially the confused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the metropolitan governments and local municipal governments, had

constrai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forms. The negative elements of Turkish centralized politics and unfair resource distributions further discounted the reforms. Nevertheless, Decree Law No 3030 had played indispensable roles in motivating municipality work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coordinating municipal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ing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